

誰是美國人

族群融合的問題與
國家認同的危機

盧梭說：「如果斯巴達與羅馬都會滅亡，那麼還能期待什麼樣的國家可以永垂不朽呢？」
到頭來，美利堅合眾國也將會遭遇像斯巴達與羅馬那般的宿命嗎？

SAMUEL 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導讀

HUNTINGTON

賽繆爾·杭廷頓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WHO ARE WE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by Samuel P. Huntington
Copyright © 2004 by Samuel P. Huntington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8 by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左岸政治 116

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作 者 賽繆爾·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譯 者 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
總 編 輯 黃秀如
美術設計 黃暉鵬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 版 左岸文化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6 號 4 樓
電 話 (02)2218-1417
傳 真 (02)2218-1142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 - M a i l service@sinobooks.com.tw
網 站 <http://www.sinobooks.com.tw>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08 年 12 月
定 價 380 元

I S B N 978-986-6723-14-8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 賽繆爾·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
-- 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
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8.12
面；公分。-- (左岸政治；116)
譯自：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ISBN 978-986-6723-14-8(平裝)

1. 民族融合 2. 國家認同 3. 美國
535.752

97020909

誰是美國人

族群融合的問題與
國家認同的危機

SAMUEL 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導讀

HUNTINGTON

賽繆爾·杭廷頓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WHO ARE WE?



論共同體的誕生與死亡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這是最佳政體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趨勢。如果連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什麼國家可以期待永久存續？如果我們想要形成一個持久的體制，那就讓我們不要期待可以使它永存。」

——盧梭，《社會契約論》，第三冊，第十一章〈論政治體的死亡〉

一、

杭廷頓是一個大開大闢的政治學家。從他早年的成名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九六八年）關於政治制度化的保守論證，到後期的經典《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九九一年），以及幾乎預見了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衝突形式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他所問的問題，永遠是歷史社會學家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所說的「大問題」（big questions），而他總是提出大膽、強烈，具有全局觀點，而且不隨流俗的解答或主張。他也是一個不畏爭議，有著強烈入世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他總是以明晰易讀的文字，表述其實具有高度理論化背景的論證。他這種將知識通俗化以介入現實的方式，使他成為當代極少數同時具有高度爭議性以及全球影響力的政治學家。在二〇〇四年的《誰是美國人》這本書中，我們再一次見到杭廷頓駕馭深奧理論，化繁為簡的驚人能力，因為他以流暢通俗的文字，寫出了一冊分析美國民族主義的起源、發展與危機的當代經典。

蘇格蘭理論家奈仁(Tom Nairn)在一九七七年出版《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從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的觀點,解釋蘇格蘭分離主義的興起,以及大不列顛分裂在結構上的可能性。杭廷頓的這本《誰是美國人》,在一個不同的意義上,可以被視為是奈仁的《The Break-Up of Britain》的美國版,因為他試圖處理的,也是美國可能分裂的結構性危機。不過,這兩冊民族主義研究經典的政治關懷剛好相反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奈仁試圖建構一個社會學的解釋來證成蘇格蘭民族主義的正當性,然而身為美國民族主義者的杭廷頓卻想藉由重新審視美國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特性與歷史淵源,為當代美國國家認同所面臨的危機提出解決之道,以防止這個國家最終的分裂。

二、

作為一次以知識介入現實的嘗試,這本書的書寫策略基本上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杭廷頓對美國當代國家認同狀態提出診斷報告,指出它處於嚴峻挑戰與危機狀態之中。其次,他再以某種歷史社會學式的敘事,追溯美國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起源、特性與演化。這個歷史敘事的功能在找出當代認同危機之根源及其解決之道。第三,作者透過細部的人口與語言社會學資料分析,重新呈現當代認同危機的樣貌;然而與此同時,他也運用民意調查和宗教社會學資料的分析,指出危機之中隱藏著轉機。在這個轉機之中,作者暗示了他心目中,真正能夠挽救美國國家認同的解決方案。以下,讓我們簡述他的論證。

杭廷頓是如何診斷美國當代國家認同狀態的呢?他又提出什麼處方呢?一言以蔽之,他認為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主義壓力下,美國已經面臨國家認同崩解,乃至國家分裂的危機。他所提出,或者強烈暗示的處方,就是將美國獨立以來國民共享的政治信條——麥爾德(Gunnar Myrdal)所命名的「美國信

條」(American Creed)，即自由、機會的平等主義、個人主義、民粹主義與自由放任經濟等價值——重新連結到它的文化與宗教母體，也就是盎格魯·薩克遜族群的新教主義文化。換言之，這是以復興美國核心族群文化來強化公民價值的認同凝聚力的策略。

此一診斷與處方，繫於杭廷頓對美國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形成與性質的認識。在本書的第二部當中，他對這個主題做了精彩的論證與鋪陳。杭廷頓認為，美國在十八世紀末立國之初，並不是一個移民社會 (immigrant society)，而是一個由盎格魯·薩克遜族裔的墾殖者 (settler) 所創建，具有明確的核心族群文化 (英語及盎格魯—新教主義) 的單一民族國家。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國家認同是一個包含了種族 (白種)、族群 (盎格魯·薩克遜族裔)、宗教—文化 (盎格魯—新教主義與英語) 與意識型態 (「美國信條」) 這四個要素的厚實、而且堅實的認同。更重要的是，這四種認同的要素是相互關連的，因為所謂「美國信條」的意識型態，並非源於歐洲啟蒙運動的普世價值，而是孕生自盎格魯·薩克遜的政治文化與宗教信仰，具有族群根源。

杭廷頓認為，美國國家與民族形成與發展邏輯，是先由一個核心族群建立了拓墾社會，確立其政治與社會制度，通用語言，以及文化規範，然後才有個別移民一波一波加入這個拓墾社會，並且同化到核心族群的制度、文化和語言之中。在這個過程當中，界定美國認同的四個要素，也逐漸開始變化。

十九世紀後半，第一波來自北歐與德國的移民擴大了美國認同中「族群」要素的意義 (因為盎格魯薩克遜族裔同屬廣義的日耳曼族裔)。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直到二次大戰爆發為止，由於第二波的東、南歐移民被有效同化 (所謂「美國化」運動的成果)，族群不再成為界定美國認同的要素。二次戰後的六〇年代，隨著新一波移民 (拉丁裔、亞裔) 進入美國，以及民權運動所獲致的成果，「種族」也喪失其界定國家認同的功能。到了七〇年代，界定美國國家認同的要素，只剩下核心文化 (盎格魯—

新教主義)和意識型態這兩項。然而從此時開始，盎格魯—新教主義的核心文化也遭受了嚴厲的挑戰。一方面，學院與政治菁英所信奉的多元文化主義對於盎格魯—新教主義，及其代表的西方文明，展開了猛烈的意識型態攻擊。另一方面，操西班牙語的墨西哥裔移民的大量進入美國，並且集中聚居在美國西南與南部的情形，也導致某種類似加拿大魁北克的地理上的「雙語美國」的現象正在發生。移民聚居也使得同化步伐變得緩慢，而少數族裔的政治菁英為了自身政治利益的理性考量，更持續對移民社區進行族群認同的動員，這更進一步阻礙同化的進展。其結果是，英語作為共通語的地位也受到了嚴重腐蝕。

根據杭廷頓的觀察，此時此刻，美國認同正逐漸變成只有植基在「意識型態」這個單一元素的稀薄、而且不穩定的認同。當代美國自由左派主張，多文化主義下的美國可以靠「美國信條」的意識型態來凝聚國民團結，但是杭廷頓認為單靠意識型態或公民意識，無法長久凝聚一個民族；除了意識型態，還需要更「濃厚」的要素來加以支撐，如共同情感、記憶、語言和文化等。更何況所謂「美國信條」並非真空中出現的普遍主義思想，而是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產物，具有強烈的族群根源，一旦其族群根源被切斷，這些信條也會喪失力量。多元文化主義攻擊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結果，等於在斬斷「美國信條」的根，使這個意識型態喪失其原有的情感與心理上的力量。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狀態，杭廷頓有沒有解決方案？他提出了四個美國未來發展的可能劇本：多元文化主義，加拿大式的雙語國家，白人對多元文化主義反彈後重建的排他性社會，以及促使各族裔共同重返盎格魯—新教主義的核心文化，以強化「美國信條」的文化基礎。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不過他逐一批評了前三種劇本的可行性：多元文化主義的純公民民族主義過於單薄，無法長久維繫國民整合；雙語國家具有高度不穩定性；白人的排他統治將導致種族衝突升高。消去法的結果，就剩下重返

核心文化的方案了。杭廷頓認為，在既成而難以逆轉的多種族、多族裔的社會人口組成現實下，唯有回歸美國民族主義原初的核心文化，也就是盎格魯—新教主義，讓這個具有強烈宗教性格的文化重新與「美國信條」產生連結，這種政治意識型態的情感召喚力與凝聚力才會夠強。換言之，只有重返「美國信條」的宗教文化根基，這個意識型態才有可能重新恢復它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那種「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 的性格與力量。他認為這個處方是具有現實基礎的。首先，根據種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大眾一般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而這與少數政治經濟與文化菁英的世界主義傾向恰成對比。第二，美國社會近年來宗教化的傾向急速增強，這個傾向創造了回歸盎格魯—新教主義所需的有力的社會心理基礎。

三、

純就知識面而言，這本用通俗易解的文字寫成的著作，其實提出了許多關於美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觀察，並且也重新提醒我們當代民族主義理論中許多尚待解答的問題。就美國這個個案而言，杭廷頓駁斥一般通俗論說的「半真理」，指出美國最初不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是一個在盎格魯、薩克遜拓墾者形成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單一種族—族群的國家，後來才逐漸因移民的進入與民權運動而發展成今天我們所認知的多種族、多族群的國家。其次，美國其實在建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面，一直都是一個族裔、宗教色彩很重，甚至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國家。所謂「美國信條」，其實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族群與宗教性的。換句話說，它首先是特殊主義的。今日我們認知的普遍主義的色彩，其實是日後才被加上去的。第三，在前述的族群、文化與宗教基礎上，「美國信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扮演的角色，是「公民宗教」，而不只是世俗的意識型態。前述三項觀察為我們澄清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美國民族主義(American nationalism)從一開始，就不算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而比較接近族群民族主

義 (ethnic nationalism)。它的公民性格 (也就是對所謂「美國信條」意識型態的重視)，其實深深植根於美國核心族群 (ethnic core) 的族群文化之中。今天我們普遍認知美國民族主義為某種公民民族主義的典範個案，其實是族群、種族與文化因素逐漸淡薄之後的結果，並非其原始樣貌。

就民族主義理論而言，杭廷頓對美國民族主義的分析，其實對所謂「公民民族主義 vs. 族群民族主義」的分類形式，提出強力的挑戰。這個挑戰中，包含一組相關的問題。比方說，純粹的公民民族主義可行嗎？特別是在已經形成種族或族群多元主義的社會中，單靠公民美德的共識，有可能凝聚文化差異的全體國民嗎？進一步而言，我們還可以追問：公民民族主義主張多元文化主義，然而如果文化差異一旦與領土基礎重合，公民民族主義的主張能夠有效阻止分離主義嗎？一般而言，公民民族主義，或者多元文化主義的立憲主義，對於雙語或多語領土的出現，多採取分權或下放權力 (Devolution) 的策略，如比較寬鬆的聯邦主義，或者邦聯的制度設計，來包容分離的主張。然而南斯拉夫的裂解、乃至不列顛聯合王國下放權力後的蘇格蘭和威爾斯的經驗說明，聯邦主義或邦聯有時反而會進一步促成分離主義。如果杭廷頓對美國西南部和南部西語區出現的觀察是正確的，那麼他對美國未來出現「西班牙語的魁北克」的預測就未必是杞憂了。而一旦美國內部的魁北克出現，距離分裂，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另一個理論問題，則涉及民族或國家認同的宗教性。當代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一般而言是世俗性的，然而國家／民族認同有可能是純然世俗的嗎？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當中，已經指出民族認同的宗教根源，以及愛國心和渴望克服死亡的救贖意識之間的密切關連。事實上，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早就指出，宗教其實就是一種「社會的自我崇拜」。如果這些智者的提醒是正確的，那麼一個純粹世俗的，缺乏超越性內涵的公民民族主義即使在理論上可能，邏輯上得以自圓其說，在現實政治中是否能夠發揮整合或動員的力量，卻是非常可疑

的。或許，盧梭在《論社會契約》第四冊第八章所說的那種「使得每一個公民會熱愛他的義務」的「公民宗教」，仍然是值得所有政治哲學家重新深思的課題。

四、

上述這些經驗與理論的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而如果杭廷頓做出了正確的觀察，我們仍然不確定他的處方——回歸盎格魯—新教主義的核心文化，是不是一個實際有效的解決方案。美國民眾的愛國心，以及他們日益增強的宗教傾向，未必表示他們渴望或願意回歸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民族主義勝利期」的盎格魯—新教主義為核心的激進同化主義路線。全球化帶來的菁英去民族化現象，以及移民浪潮和民權法案所創造的族群政治動員，都是政治與社會的「冷硬的現實」(Hard Facts)，需要複雜的制度設計、政治協商，以及漫長的教育過程，才有可能找到解決之道，並非一元化的同化主義可以處理的。非洲族裔的歐巴馬在這次總統大選脫穎而出，更說明了所謂盎格魯—新教主義的「核心文化」的霸權，將更進一步式微。杭廷頓的提案，顯然是一種時代錯誤的思考。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全球化和多文化主義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依然是真實而嚴峻的。那麼，如何尋找到，或者創造一個非霸權的、共和式的——或者借用傑克森牧師(Jesse Jackson)的競選標語，「彩虹聯盟」式的新文化形式，它既寬容多元差異，而又能召喚出某種共同的熱情——這就會是即將領航美國的歐巴馬總統，以及所有當代自負的美國公民所無法迴避的課題。

五、

一個半世紀以前，詩人惠特曼在藍色的安大略湖畔沈思他的祖國。他是自豪的，充滿榮耀感的，

當他想起美利堅，那包容的，那強大的，那眾多的，那自身即宇宙的，那接納一切而同化一切的，偉大的美麗：

一個民族正在宣告自己

我僅以自身之力成長，僅以自我成長為人所知

我不拒絕任何人，我接納所有人，然後我使人人重生，依照我的容貌

詩人是如此沈涵於美利堅的豐富，自足，豐富自足到所有善與惡，一切美與醜都來自祖國自身內部，不假外求——甚至死亡，甚至毀滅，也竟然如同生命，一起受孕，如陰影擁抱光線……

（啊母親——啊親愛的姊妹

假若我們已然迷失，那麼不是任何勝利者摧毀了我們

是我們自己

帶領我們沈淪至永恆的黑暗）

一個半世紀以前，詩人在狂喜的瞬間，已經窺見一個共同體同時的降生與死亡。

然而共同體如何重生？詩給我們啟示，但此刻我們需要哲學的智慧。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港四分溪畔）

前言

本書要討論的是，發生在美國國家認同的顯著性與實質意涵上的變化。顯著性是指相較於其他認同，美國人對國家認同所賦予的重要性。實質意涵是指美國人認為自己擁有哪些可用來與其他人有所區別的共同之處。本書將進一步深入探討以下三項主要論點。

第一，美國人對國家認同所賦予的重要性，在歷史上的各個階段都是不相同的。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後期，定居在大西洋沿岸的英國墾殖者才開始認為自己不僅是個別殖民區的住民，而且也是美洲人。獨立戰爭之後，「美國」的概念也開始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時，這個概念才逐漸並緩慢地獲得了確立。在內戰之後，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已經超越其他不同種類的認同，而美國民族主義也在後來的一個世紀中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次國家認同、雙重國家認同，以及跨國家認同等概念，開始與國家認同的概念相互較勁，從而損害了國家認同的重要性。然而，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又讓美國國家認同的重要性重新占得上風。只要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就有可能產生高度的國家認同感；不過，一旦美國人認知的威脅程度降低了，那麼其他認同的重要性又會再次凌駕於國家認同之上。

第二，從獨立建國兩百多年來，美國人一直試圖從種族、族裔、意識型態與文化等角度來界定其國家認同的實質意涵，雖然對於這些角度的重視程度有所不同。種族與族裔的因素現在大致上已經被

也消除了：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一個多族裔、多種族的社會。最初由湯瑪斯·傑佛遜所提出來，並由其他人士進一步闡釋的「美國信念」，被廣泛認為是界定美國國家認同的關鍵要素。然而，這些信念，卻是創建美國的那些墾殖者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提出來的一種特殊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化的關鍵要素包括了：英語、基督教、宗教使命感、英國人的法治概念、統治者的責任與個人權利，以及與傳統天主教不同的基督新教價值觀，包括了個人主義、工作倫理，以及相信人類擁有嘗試建立一個人間天堂，也就是「山巔之城」(Civitas Dei)的能力與責任。從歷史上來看，之所以會有數百萬移民者紛紛來到美國，就是被這種文化，以及這種文化所促成的經濟機會所吸引。

第三，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盎格魯—新教文化已然成為美國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這種文化不但是美國人所擁有的共通之處，而且根據許多外國人的觀察，這種文化也是區分美國人與其他族裔人士的主要特點。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後期，盎格魯—新教文化的顯著性與實質意涵卻受到若干現象的挑戰，包括了來自拉丁美洲與亞洲的新移民潮；多元文化主義學說在學術界與政治圈子裡的流行；西班牙語成為美國的第二語言與美國社會中出現的西語裔化趨勢；主張以種族、族裔與性別為基礎的群體認同；離散族群(Diaspora)與其祖國政府的影響；以及菁英分子擁抱世界主義與跨國認同的態度有越來越強化的傾向。為了回應這些挑戰，美國國家認同可能朝著下列五個方向演變：(一)一個只強調信念的美國，亦即缺少其歷史文化的核心，只憑藉著共同承諾對美國信念的原則而團結在一起；(二)一個分為兩極的美國，擁有兩種語言(西班牙與英語)以及兩種文化(盎格魯—新教文化與西班牙文化)；(三)一個排他主義的美國，亦即再次以種族與族裔來定義國家認同，進而排除並/或壓抑那些非白人與非歐裔人士；(四)一個恢復生氣的美國，亦即重申其歷史性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宗教使命感與價值觀，而這樣的文化，也將藉由對抗一個不友善的世界而得到進一步鞏固；(五)某個結

合了這些演變與其他可能性發展的美國。然而，美國人界定自己認同的方式，也會影響到對於美國究竟是以前世界主義、帝國主義，或者是民族主義的態度來與世界各地維繫關係的認知與看法。

我是以身為一個愛國者與學者的身分來撰寫這本書。作為一個愛國者，我相當關心我的國家是否能夠維持團結與力量，是否能夠繼續維持一個以自由、平等、法律與個人權利為基礎的社會。作為一個學者，我發現美國國家認同的歷史演變與現狀其實是一個極具吸引力且重要的議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深入研究與分析。然而，愛國精神與學術精神偶爾會是相衝突的。在瞭解到這一點之後，我試圖要以超然的態度，一方面仔細分析手邊的各项證據與資料；另一方面，我也要提醒讀者，因為本身愛國精神的影響，我會希望能夠找出這些證據與資料在美國的過去與可能的未來上所具有的意義與效用——這種心態自然也會影響到我對於這些證據與資料的挑選與敘述。

所有社會的生存都會面臨到一次又一次的威脅，而最終也將屈從在這些威脅之下。然而，某些社會即使是在面臨威脅的情況下，還是能夠藉由終止與逆轉衰落過程，以恢復活力與重新取得認同，進而延緩滅亡的時間。我相信美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而美國人也應該重新承擔起復興盎格魯—新教文化、傳統與價值觀的責任。因為這些文化、傳統與價值觀正是所有美國人——不分種族、族裔與宗教——在過去三個半世紀以來所擁抱的，同時也是美國人之所以能夠擁有自由、團結、權力、繁榮，並且在這個世界上扮演推動良善力量之道德領導者的根本理由。

讓我進一步說明這個論點：我所強調的是盎格魯—新教文化有其重要性，而不是主張盎格魯—新教徒具有重要性。我相信美國的最偉大成就之一，或許正是最偉大的成就，就是美國已經破除了歷史上與其國家認同密不可分的種族與族裔界線，而成為一個多族裔、多種族的社會——社會中的所有不再因其種族或族裔背景而有所區分，只會依其功過是非而受到評斷。我相信這個理想已經實踐了，

因為歷代的美國人都已經承諾要發揚盎格魯—新教的文化與那些建國者所提出的信念。如果美國人能夠繼續堅持這個承諾，那麼，即使那些建立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後代已經成為少數，同時也已經不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美國仍然能夠歷久不衰。那正是我所認識且深愛的美國。正如同這本書所引用的各項證據與資料，這樣的美國，就是大多數美國人所熱愛且企求的美國。

目錄

導讀

論共同體的誕生與死亡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吳叡人

2

前言

10

第一章

國家認同的危機

20

顯著性：旗幟依舊在？

實質意涵：我們是誰？

全球認同危機

美國國家認同的可能發展

第二章

認同：國家認同與其他

38

認同的概念

他者與敵人

認同的來源

錯誤的二分法

第一部分 認同的議題

PART I THE ISSUES OF IDENTITY

第二部分
美國國家認同

PART II
AMERICAN IDENTITY

第三章

美國國家認同的構成要素
變化、連續性與不完全的事實
移民前的墾殖者
不只是信念
不歸屬於某地
種族與族裔特性

52

第四章

盎格魯—新教文化
文化核心
異議中的異議
美國信念
個人主義與工作倫理
道德主義與改革倫理

76

第五章

宗教與基督教
上帝、十字架與美國
一個虔誠的民族
新教的美國與天主教
一個基督教民族
公民宗教

96

第六章

國家認同的出現、勝利與腐蝕
國家的脆弱性
創造一個美國認同
國家認同 vs. 其他認同
國家與愛國主義的勝利
消逝中的民族主義

121